

美防长来亚洲“大声咳嗽”秀军事存在

美国防长阿什顿·卡特昨天从日本抵韩访问，舆论普遍预测双方将谈及美国在韩部署萨德反导系统问题。韩国方面坚称卡特的访问不涉萨德，美方在这次访问中将不对萨德采取“三不”态度，也就是不要求、不商讨、不决定，这被认为是韩国顾忌中国感受的表现。

萨德是高空反导系统，美韩均称该系统在韩部署计划只针对朝鲜，不针对中国。但这被几乎所有中国军事分析人士当成是“哄小孩子的话”。可以肯定，如果该系统最终登陆韩国，将沉重打击中国舆论这些年积累的对韩国的好感，动摇两国关系的基础，首尔切莫对此存侥幸心理。

亚洲当前最热的话题是亚投行和“一带一路”，卡特在这个时候过来，使劲咳嗽了几声，像要显示美国几个军事同盟的威严。卡特与日本方面共同表示加速修订美日防卫合作指针，进一步给日本自卫

队松绑。双方谈话涉及钓鱼岛、南海，很多话或明或暗都是冲中国来的。

人们注意到，美日是亚太主要成员里仅有的两个没加入亚投行的国家，两国对提升军事同盟的威慑力倒是很麻利，这种“巧合”让人想到，这就是两国对以亚投行为重要象征的这个时代的回应。

韩国像是存了个心眼，它有挣脱美日路线的明显迹象，它在东北亚对平衡术的钻研最认真，它的未来倾向不太说好。

中国如今对军事谈得相对最少。尽管中国军费在增长，军力在提升，但“一带一路”、亚投行这些经济规划更被突出，它们对中国的符号代表性显然超过了新造的航母或者隐形战斗机。日本

能不能告诉我们，它这几年除了闹解禁集体自卫权，调整美日防卫合作指针，还有闹参不参拜靖国神社，它给亚洲和世界带来了什么更刺激的经济发展规划？

如今日本很像完全钻进了地缘政治的牛角尖，眼里除了现实安全威胁和危机，就是潜在的威胁和危机。神经质的日本与忧心忡忡的美国一拍即合，双方在东京发出的地缘政治尖叫似乎要逼人们从亚投行的合作热情中“猛醒”。

然而美日的思路错了。亚洲没人想和它们打仗，它们自己也不真勇气靠武力解决问题。美日防卫合作指针调来调去，也调不出能够补足两国对21世纪信心的药方。这是铸成两国对亚投行错误态度的同一战略思维在另一方向的表现。

美日在亚太所面临的问题都不是它们的安全体系出了多大漏洞，也许美国调遣军力、强化同盟做起

来最容易、方便，日本搞政治突破也最容易找到抓手，所以两国不停地在这些领域折腾，以此“平衡”中国崛起。然而中国走了一条面向亚洲和世界的合作共赢之路，我们推出亚投行，使得传统地缘政治那一套使不上劲，找不到北。美日该认真反思了。

美国加强和扩大它在西太平洋的军事同盟关系是逆时代潮流而行，日韩澳等国在这方面有的跟美国紧些，有的松些，其中跟得最紧的日本把美国当成了“国际社会”，但东京的孤立性已经开始露出苗头。日本从加强美日同盟的所得越来越小，它在显出某种“另类”。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究竟会把日本等朝“孤僻”的方向带多远，这是个有趣的未知数。▲



民族主义，一件不再合身的西服

王维嘉

民族主义是伴随着民族国家出现的。300年前，世界上没有民族国家。西欧是天主教会与神圣罗马帝国共治下的封建法治王国；东亚则是基于儒教文明的“天下体系”。

民族主义是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

16-17世纪发生在西欧的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和科学革命把个人从原来的有机体中解放出来，“个人”成为社会的基本单元，社会的组织形态演变为基于契约的社会，“个人权利”成为达成社会契约的基本前提。判别一个社会成员的标准通常是文化、语言、地域等属性。具有相同属性的一群人通过契约方式组成的社会就是“民族国家”，社会契约就是该国的宪法。

这样的社会调动了个人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契约社会和市场经济天然吻合，这两者同时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此前不论是欧洲的封建王公或是中国的宗族，都截流了大量财富，而民族国家打碎了这些“截留”财富的中间层，直接从个人汲取财富，因此民族国家比传统社会不仅能产生更多的财富，也能集中更多的资源。一旦第一个民族国家诞生，周边国家要么被吃掉，要么必须转型为民族国家参与竞争。

欧洲民族国家滥觞于法国大革命，拿破仑的铁蹄唤醒了欧洲。从18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从欧洲到拉美，到亚洲和非洲，一波接一波的民族解放，国家独立的浪潮，直至推动全世界都完成了向民族国家的转型。

民族主义是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民族主义着眼于本民族的生存发展，强调本民族文化历史的优越性。民族主义给个人提供了归属感和使命感。在弱肉强食的民族国家丛林中，民族主义对内可以凝聚民众以统统治；对外可以动员资源以御强敌。由于民

族主义用本民族的生存发展和文化历史优越性做动员，一个民族国家必然要和周边的其他民族国家产生利益和文化的冲突，因此民族国家的形成无不伴随战争和血腥，而且愈演愈烈，直至爆发死伤无数的两次世界大战。二战后各国人民痛定思痛，决意抑制民族主义的阴暗面，避免再次爆发大战，为此1945年在旧金山制定了联合国宪章并成立了联合国。

中国向民族国家转型的曲折历程

中国作为一个文明体系向民族国家的转型一直曲折而迷茫。从秦到清，中国一直是三个等级的儒家文明同心圆：中原地区是儒家的最高文明，其次是归化儒家的藩属地区，再外面是有待教化的“蛮夷”之地。中国人的定义和种族地域无关，只要信奉儒家，蒙满皆可入主中原。

从英国特使马嘎尔尼拒绝跪拜乾隆皇帝，到庚子之变八国联军入侵北京，西方“蛮夷”以坚船利炮逼着大清这个文明体系成为一个民族国家。孙中山革命的动员口号是基于种族的“驱逐鞑虏”，及至革命成功发现基于汉族的民族国家无法包容少数民族所在的疆域，于是改为“五族共和”。中国从此走上民族国家的转型之路。

1949年后，中国加入了共产国际体系，在世界范围内以阶级划分敌我，并支持世界革命，弱化了民族国家的性质。及至1978年改革开放，中国又重新以民族国家的身份加入世界。当时作为一个弱国，民族国家的身份对中国基本合适，因为据此可以保护自己的利益。放弃世界革命的目标后，只有民族主义可以成为凝聚民众的动员力量。

30多年后的今天，中国已然成为一个世界贸易金融大国，未来的主要利益将遍布全球。“一带一路”的提出，亚投行的建立，“命运共同体”的提出，都标志着中国正在迈向世界性大国。此时民族主义的弊端益发凸显。对外，一个日渐强大的国家过度诉诸民族

主义将刺激周边国家，助长后者的民族主义并将他们推向对立面。在国家内部，民族主义在很多时候会转化成国家决策的特殊压力，并与各种破坏性思潮建立不规则的临时关系。

中国走向世界，要倡导一种世界主义

反观历史上的世界性大国，都需要倡导某种世界主义。这种世界主义的特征是声称要么有利于各国经济，要么有利于世界和平。因为世界主义的诉求至少在形式上并非为自己一国一族着想，因而相对容易说服其他民族国家接受。当然，世界主义要被相信和接受必须得到验证，即其他国家能在这个世界主义下得到实惠和好处。一个世界性大国的领导力，往往体现在成熟地把握自己和别人之间的利益平衡。正如外交学者施展教授指出的，世界性大国的利益和为其服务的世界主义像是“开大卖场”，维持秩序，保证公平，以吸引更多的中小国家来设摊位并从卖场的整体繁荣中获利。而民族主义是争取自己“摆个最大的摊位”，并和其他摊位竞争。

同样道理，当中国准备领导世界时，必须有为其他国家接受的世界主义。这种世界主义可以是全新的价值和利益体系，但更可行的是与其他价值及利益体系交流、互动的集大成式发展。中国倡导的基于合作共赢的新国际秩序观正是这样一种世界主义的尝试。

民族主义曾是世界潮流，在它的推动下，中国推翻了满清帝制，坚持了八年抗战，创造了今天的经济奇迹。但民族主义这件当年为小国林立的西欧美身定做的衣服，从来就对多民族、多文化、超大规模的中国不完全合身。今天当中国走向世界性大国时，这件西服更显得捉襟见肘。例如当中国开始主导国际多边组织时，势必要考虑其他成员的利益，由于普通民众无法了解全局，任何短期让步或局部折中都可能遇到民族主义情绪的反弹。但我们有理由预期，思维不尚绝对化的中国或许能够比历史上的世界性大国更好地把握平衡。▲(作者是斯坦福大学博士、CEI中国企业研究所所长)

英国、以色列、韩国、澳大利亚等美国一些最为亲密的盟友最近决定不听从美国破坏中国发起的旗舰项目——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指令，这是奥巴马政府最严重的外交失策之一。

自去年10月中国提出亚投行倡议以来，这一专注于亚洲基础设施开发的全新借贷机构便遭到了华盛顿的冷遇。美国的官方借口——担心其治理和透明度标准，从来就没有让人感受到真诚。真正的动机或许是，担心中国将对亚洲开发银行、美国占据统治性地位的世界银行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现

抵触亚投行，美国道德失分

【美】盖尔·拉夫特

有金融机构构成外来挑战。但从一开始，抵制亚投行的做法便是错误的，这不仅是指外交层面，甚至在道德层面也是如此。

尽管总是在谈论“转向亚洲”战略，但奥巴马政府却未能意识到，亚洲现在最需要的并不是更多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而是数十亿美元投资于能源、水利、运输和电信等领域。换言之，少点枪炮，多点黄油。

为了明白美国反对亚投行的错误，我们需要仔细思考一些数字。亚洲开发银行曾表示，为了保持增长并让数百万亚洲人民摆脱贫困，亚洲每年需要投资约8000亿美元。但亚洲开发银行和世界银行的总投资资金分别为1600亿美元和2800亿美元，甚至还不足以满足亚洲一年的投资需求。因此，外界很难理解，为何中国倡导的、启动新银行符合美国标准的猜忌性努力，待美国支持的国际金融机构做出最终投资决定后便会揭晓答案。一种更值得称赞的反应或许是，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今年秋天到访华盛顿之时，奥巴马总统能够用新银行的成员身份卡，甚至是存单来表示欢迎。▲(作者是美国全球安全分析研究所执行所长、美国能源安全理事会高级顾问，本文由伊文翻译)

亚洲贫困人民而言不啻为一种羞辱，因为煤炭是他们唯一物美价廉的能源来源。拒绝让全球最贫困人口使用最廉价能源，华盛顿事实上让数十亿全球贫困人口陷入无休止的贫困之中，而这正是北京想要改变的。

东南亚便是一例。根据国际能源署的统计数据，东盟6亿人口的经济总量将在2035年增长两倍，该地区的能源需求也将增长80%，这一增量相当于日本当前的能源需求量。在整个东南亚地区，有1.3亿人生活在没有电的环境中。由于天然气和太阳能、风能等可替代能源的

成本远超煤炭，该地区在建发电厂中有3/4使用煤炭也就不足为奇了。印度的情况则更为严重，该国有3亿人用不上电，还有数亿人经常断电。美国国务卿克里访问印度时，要求印度将气候变化作为重中之重，这不过是“停止使用煤炭”的委婉之语。但印度的回应是计划到2020年将煤炭消耗量增加一倍。

除了加拿大和日本以外，美国最为亲密的盟友逐一表明态度：它们对于亚洲的发展需求并非不闻不问。作为创始成员国加入亚投行，它们向华盛顿发出了信号：全世界最贫困人口不能因为多年后气候变化的担忧或者大国角力而被牺牲。

目前美国政府打算优雅地撤退，称现有的国际金融机构愿意共同出资亚投行。究竟这一橄榄枝是抗击贫困的真实意愿表示，抑或是推动新银行符合美国标准的猜忌性努力，待美国支持的国际金融机构做出最终投资决定后便会揭晓答案。一种更值得称赞的反应或许是，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今年秋天到访华盛顿之时，奥巴马总统能够用新银行的成员身份卡，甚至是存单来表示欢迎。▲(作者是美国全球安全分析研究所执行所长、美国能源安全理事会高级顾问，本文由伊文翻译)

